

剩下的交给 AI：人机分工时代的教育本质 重思

王喆生

南京传媒学院摄影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本文以中国传媒大学调整包括摄影专业在内多个本科专业这一事件为切入点，深入反思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与范式危机。研究指出，当前教育决策中隐含的“工具理性”倾向，试图通过紧密贴合 AI 发展来判定专业的“前途”，这实质上可能导致教育滑向培养“高效工具人”的歧路。本文认为，专业教育的本质并非提供确定性的职业“地图”，而是赋予学生一次进行深度体验、试错与“自我确认”的“航海罗盘”。文章通过回溯摄影术解放绘画的历史隐喻，AI 时代的技术冲击非但不应压缩人文艺术教育的空间，反而应成为其解放与深化的契机。教育的未来不在于“剩下的交给 AI”，而在于构建一种能激发人的独特性、对真实感的包容、能驾驭技术、具备批判精神、创造性思维与鲜活生命力的、不可被算法复制的“活人”。

关键词：人工智能；高等教育；专业调整；自我确认；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想象

DOI: 10.64649/yh.shfzykcx.issn3078-8994.202604001

1 从“榜首专业”调整引发的教育叩问

2026 年中国传媒大学宣布对包括翻译、摄影等在内的 16 个本科专业及方向进行调整。该校党委书记廖祥忠对此阐释是：未来将是“人机分工时代”，课堂必须彻底重构，教师需明确自身在知识体系中的新坐标，“剩下的交给 AI”。颇具讽刺的是，在同年发布的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中，中国传媒大学的摄影专业（专业代码：130404）位列全国第一，评级为 A+，在“学校条件”、“学科支撑”、“专业生源”、“专业就业”、“专业条件”等多维指标上均表现优异。这一事件构成了一个鲜明的时代悖论：一所大学内的全国顶尖专业，是如何判断做出如此果断甚至引发争议的调整决策？

显然人工智能浪潮席卷下的高等教育，正在面临集体性的焦虑与深层的范式危机。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是：当 AI 日益胜任知识传递、技能模仿乃至部分创作性任务时，大学教育的不可替代性究竟何在？当前教育实践中弥漫的、以“是否易于与 AI 结合”或“短期就业前景”为前提的专业价值评判，潜藏着深刻的“工具理性”风险。

当然决策本身也构成了观察当下教育决策逻辑的一个典型样本。排名体系本身，是现代社会的“可计算性”与“标准化”思维的产物，它通过一套复杂的量化指标（如学校条件、学科支撑、就业数据等），试图对难以完全量化的教育质量进行“测绘”与“排序”。这种测绘在提供可比信息的同时，也无形中强化了教育的工具性导向——专业价值与其在排名指标上的得分高度绑定。然而，当校方依据“人机分工”的未来图景对排名榜首的专业进行调整

时，实则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决策逻辑：一种超越既有评价体系、面向未来技术生态的、新的“工具理性”正在形成。它以“与 AI 的契合度”和“在预期人机分工中的位置”作为预判专业前景的标尺。其潜在的危机在于，它可能将教育简化为一套关于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冷酷的技术经济学计算。廖祥忠书记所言“剩下的交给 AI”，若被简单理解为将可编码、可重复的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剥离给机器，那么教师与学校需承担的“剩下”部分究竟是什么？倘若答案仅是更高阶的、但仍为服务于特定系统效率的“问题解决”或“创新”，那么教育仍未能跳出培养“高级工具”的范畴。历史上的类似抉择不乏其例：千禧年代，成绩优异的理科生多被师长鼓励涌入“前景广阔”的土木工程领域，然而宏观周期的波动可能重塑每个人的职业轨迹。这警示我们，将年轻人的命运过度系于对产业趋势的预测，是脆弱且不负责任的。教育决策的权力若过度集中于对“趋势”的判定，便可能以“未来”之名，剥夺了学生探索多元可能、定义自身“前景”的权利。当代大学生中对未来感到“迷茫”的比例，远高于有清晰的规划者。这种迷茫，部分正源于教育系统过于急切地提供“答案”（热门专业、就业通道），而未能充分提供探索“问题”（我是谁、我热爱什么、我想成为怎样的人）的空间与支持。当教育决策过于聚焦于如何将学生塑造成适应某个预定系统（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 AI 系统）的部件时，便可能与受教育者内心对意义、联结与自我实现的深层渴望产生疏离。

2从“地图”到“罗盘”：专业教育作为“自我确认”的体验过程

要超越工具理性的局限，必须回归对专业教育本质的再认识。专业教育，并非一份注定通往特定职业的、不容置疑的人生“地图”。其更根本的价值，在于它为青年提供了一次为期数年的、制度性保障的“深度体验”机会——一次对某个知识领域、思维方法乃至潜在行业生活方式的沉浸式接触与操演。通过这种接触，学生得以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试错成本远低于真实社会），检验自己的兴趣、天赋、价值观与可能的生活选择是否匹配。这个过程，本质上是一次严肃的“自我确认”。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所言，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过程。其核心在于“唤醒”与“生成”，而非“灌输”与“塑造”。大学四年之所以在许多人生命中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并非仅仅因为获得了某项专业技能，而恰恰在于这段时光允许并鼓励了一种“放下忧虑”的探索状态。在这里，学生首次有机会脱离应试的单一轨道，在知识、社团、友谊、爱情乃至些许“失败”的体验中，感受具体的快乐与痛苦、烦恼与关切、沮丧与喜悦，构成了人格的筋骨与血肉，让人真正“感受自我、确认自我”。是学生的自主选择带来的生命律动。

“自我确认”包含双向维度：一方面是发现并发展自身的优势与潜能；另一方面，或许是更重要的，是学习接纳自身的不足与缺陷。一个完美的、没有缺陷的存在，往往是令人不安的，甚至是非人的。电视剧《黑镜》中有个故事：老公突然车祸去世了，公司给妻子送来一个复制的丈夫，很体贴，最后这个妻子还是受不了，为什么？它没缺点，一个活人一定是有缺陷的。他让你欢乐，也让你痛苦，快乐使人简单，痛苦让人深刻。正是缺陷，使得生命个体变得独特、真实且值得交往。教育的崇高目标之一，应是帮助学生认识到，人之为人的完整性，恰恰在于这种优点与缺陷的统一。而当前某些教育倾向，在追求“达标”、“优秀”、“与AI互补”的过程中，无形中营造了一种不能容忍失败、排斥缺陷的氛围，这实质上是在压抑人之为人的本真性。一个专业更像是一把交给学生使用的“锤子”，它是你迈向社会的一个开局的初始武器。它让学生有机会去“上手”和“操持”，感受其重量、平衡与反馈。但教育的真谛不在于确保每个人都成为这件工具的熟练工匠，而在于通过使用这件工具的过程，去敲击世界从而判断自己是否喜欢、是否擅长这种武器，进而思考自己究竟想用什么样的“工具”去构建与世界的关系。这个过程是与世界、

与自我进行“深度交往”的社会化过程，其产出不是标准化的技能佐证，而是认知社会的某个行业模式、价值判断与人生取向。

3 AI作为“解放者”：人文艺术教育的再审视与创造力勃兴

在“人机分工”的讨论中，人文艺术学科常被置于“无用”或面临被替代的境地。然而人工智能的时代，非但不是人文艺术学科的末日，反而可能是其价值重估与创造性解放的重大历史契机。举个例子，1839年摄影术诞生前，绘画长期承担记录现实的功能（如宫廷肖像、宗教题材绘画）。而摄影术发明之后，绘画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它不用非要“画的像”，可以是印象派对光线的瞬息捕捉（如莫奈、塞尚、米勒），可以是立体的空间解构（如梵高、马蒂斯、毕加索），再到后来抽象派、野兽派。绘画在摄影发明之后的100年里，出现了几十种风格迥异但颠覆想象的现代性探索。摄影的发明剥离了绘画作为一种工具式的媒介，释放了绘画能给人提供想象空间的特性。

人工智能的冲击，与当年摄影术的冲击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AI正在或即将娴熟掌握众多模式化、规则化的创作：它可撰写格式规范的报告、模仿经典风格的画作、创作符合格律的诗词，甚至生成流畅的新闻稿。这恰恰构成了对当代教育，特别是人文艺术教育的“摄影术发明时刻”。当AI能够高效处理那些“有法可依”的部分时，教育就必须转向那些“无法可依”的深层领域。

批判性思维与伦理追问：AI可以提供信息，甚至模拟论点，但它无法替代人类对信息真伪、价值立场、伦理困境的审视、辨析与抉择。教育需培养的是能对AI生成内容进行批判性评估，能对技术应用进行伦理反思的头脑；独特的创造性想象：AI的“创作”基于对海量已有模式的融合与衍生，其本质是概率化的优化。而人类最珍贵的创造力，往往源于非逻辑的直觉、跨界的联想、对禁忌的突破以及对个人独特生命经验的转化。这是一种“使其有”的原创性，而非“使其优”的优化；文化共情与意义建构：AI可以分析文化符号，却无法真正体验乡愁、理解悲剧的净化、或在集体仪式中感受归属。人文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对复杂文化文本、历史情境与人类处境的深度理解与共情能力，在于帮助个体在芜杂的世界中建构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提出“非模式化问题”的能力：未来的关键分野，或许不在于谁能更好回答既定的问题，而在于谁能提出全新的、颠覆性的、跳出既有框架的真问题。这需要一种勇气、想象力与现实关怀的思维品质。

因此, AI时代的教育, 不应是人文艺术的退场, 而应是其走向中心舞台的接力棒。它要求教育转向思维锻造与灵魂激发; 从培养“知晓答案”的人, 转向培养“勇于并善于提问”的人。

4 培育“活人”: 超越工具化规训的教育生态重构

当 AI 接管大量程式化工作, 教育的终极使命愈发清晰: 培育真正的“活人”。所谓“活人”, 是相对于“工具人”而言——他/她不是任何系统(无论是工业系统、商业系统还是 AI 系统)中一个可被随意替换、功能单一的标准化部件。“活人”具有内在的丰富性、矛盾的统一性、自主的意志与不可复制的独特性。

反观当下, 无论是传统的学校规训系统, 还是新兴的、基于算法推荐的数字沉浸环境, 都存在将人“工具化”或“扁平化”的风险。很多学生在高度结构化的校园生活中显得“暮气沉沉”, 却在诸如漫展 COSPLAY 等自主选择的亚文化场景中“生龙活虎、侃侃而谈”。这种反差提示, 固有的教育环境可能在无形中压抑了学生本真的表达与活力。高校应像一座“思想与生活的百草园”, 尽可能提供跨学科课程、辅修机会、项目制学习、gap year 制度等, 让学生能在低成本试错中广泛探索。专业间的壁垒应更具渗透性, 允许甚至鼓励学生在不同领域间穿梭、比较、最终自我锚定; 尊重并激发独特性: 教育评价应超越单一的分数与排名, 探索能够识别并鼓励不同形式智能、创造力与个性特质的多元评价体系。教育者的角色, 应从“评判者”更多转向“观察者”、“引导者”与“对话者”; 拥抱“缺陷”与复杂性: 教育应敢于讨论失败、迷茫、痛苦与无意义的体验, 将其视为成长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文学、艺术、哲学与伦理课程, 引导学生思考生命的有限性、矛盾的必然性与意义的开放性, 从而获得一种更深沉的成熟与韧性; 促进深度交往与社会连

接: 强化线下、小规模、基于真实项目的学习共同体建设, 鼓励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进行有挑战性的对话与合作。让学校成为实践哈贝马斯所言“交往理性”的公共领域, 而不仅是知识传输的管道; 培养技术主体性: 教育的任务不是让学生对 AI “言听计从”, 而是使其成为技术的清醒主宰者。这意味着既要教授 AI 的原理与应用, 更要培养其批判性审视技术局限、伦理风险与社会影响的能力, 最终达到“熟练运用 AI, 而不被 AI 所摆布”的自主状态。

5 结语

此次中传的专业调整事件像是一个石头击中湖心, 泛起的涟漪触及了 AI 时代高等教育的每一个角落。它迫使我们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 当机器日益智能, 我们何以育人? 真正的出路在于对“人机分工”进行阶梯性的理解。未来的分工, 不应是人与 AI 在同一个“工具性”任务链上的简单任务切分, 而应是一种根本性的“价值分工”: AI 负责处理模式化、计算性、重复性的“世界”, 而人, 则必须专注于那些唯有生命体才能承担的领域——意义的寻求、价值的创造、伦理的抉择、美的发现、共情的体验以及对未知的想象性探索。因此, 教育的坐标必须重新锚定于“人之为人”的那些根基性特质。大学教育的核心产品, 不应是贴着专业标签、具备特定技能组合的“人力资源”, 而是具备文化共情、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想象、伦理自觉、以及终身学习与自我建构能力的、完整的“人”。他们接纳自身的缺陷与局限, 并因此更能同情他人的处境, 理解世界的复杂。

教育在 AI 时代的使命, 或许正如摄影术解放了绘画, 不是让我们更“像”高效运行的机器, 而是让我们更彻底、更丰富、更勇敢地成为“人”——那个有缺陷、会迷茫、但也能感受复杂的伤感与喜悦、在不间断的关系中, 确认自身的鲜活与存在。这是任何排名都无法衡量, 恐怕目前技术也无法替代的。

参考文献:

- [1] 刘燕楠, 侯怀银, 陈星平.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危机与哲学重构 [J]. 浙江社会科学, 2025, (07): 91-102+158. DOI: 10.14167/j.zjss.2025.07.010.
- [2] 孙发勤, 冯锐, 邓文博. 守护教育之“魂”: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价值坚守与人本回归 [J]. 电化教育研究, 2025, 46(11): 11-17. DOI: 10.13811/j.cnki.eer.2025.11.002.
- [3] 马志强, 崔鑫. 交互主体性视角下的人机协同教学模式: 理论框架与实践形态 [J]. 电化教育研究, 2026, 47(03): 14-21. DOI: 10.13811/j.cnki.eer.2026.03.002.
- [4] 周光礼, 公钦正, 姜尚峰. 面向教育强国建设: 高校学科专业调整的模式重构与路径创新 [J]. 高校教育管理, 2026, 20(02): 1-12. DOI: 10.13316/j.cnki.jhem.1673-8381.2025-2571.

作者简介: 王喆生(1990—), 男, 辽宁沈阳人, 教师, 讲师,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摄影艺术。